

●孔子

●孙子

●老子

●墨子

●孟子

●庄子

●惠子

●公孙龙子

●荀子

●韩非子

东方人类智慧的高峰

中华民族思想的源头

先秦 大哲学家

张燕耕/著

先秦

大哲学家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教育出版社

张燕耕/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先秦十大哲学家 / 张燕铎著. —昆明: 云南教育出版社, 2007.5

ISBN 978-7-5415-3225-2

I. 先… II. 张… III. 哲学家—思想评论—中国—先秦时代 IV. B2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69219 号

责任编辑 杨 林 江 跃

封面设计 高 伟

责任印制 荣 璟

书 名 先秦十大哲学家

著 者 张燕铎

出版发行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教育出版社

地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 编 650034

印 刷 云南国防印刷厂

字 数 180 000

开 本 889×1194 1/32

印 张 6.5

版 次 2007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5-3225-2

定 价 15.00 元

凡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张燕桦 1953年生于上海，江苏南通人。1970年由上海到云南西双版纳大勐龙农场当知青，历时八年。1982年毕业于云南师范大学政教系，1989年毕业于云南大学政治学研究生班。现任昆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政教系主任。合著有《西方智慧之路》、《中国哲学史要》、《儒商读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新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等著作和教材，并在报刊上发表学术论文二十余篇。



目 录

引 言

百家争鸣——先秦诸子哲学的文化生态	1
礼崩乐坏——先秦诸子哲学的社会环境	4
早慧的文明——先秦诸子哲学的形态特征	6

第一章 孔子	9
圣贤人生	9
“仁者，人也”	13
“道之以德，齐之以礼”	19
“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	21
“安贫乐道，见利思义”	23
“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	26
仁者的智慧	28

第二章 孙子	30
谋略人生	30
“不战而屈人之兵”	32
“知彼知己，百战不殆”	36
“奇正相生，以奇制胜”	40
谋士的智慧	42

第三章 墨子	44
侠义人生	44
“爱无等差，兼以易别”	48
“义为利本，以义生利”	52
“兼相爱，必得赏，别相恶，必得罚”	55
“取实予名”、“言必立仪”	58
行者的智慧	60
第四章 老子	62
无为人生	62
“道”生万物	66
“反者道之动”	72
柔弱胜过刚强	73
“小国寡民”	77
隐士的智慧	80
第五章 孟子	82
浩然人生	82
“得民心者得天下”	86
“仁义礼智根于心”	90
“我养吾浩然之气”	94
“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97
义者的智慧	100
第六章 庄子	103
逍遥人生	103
“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六极之下而不为深”	106
齐万物，齐是非，齐物我	108
“以有涯随无涯，殆也”	117

“独与天地精神往来”	118
游者的智慧	124
 第七章 惠子	126
智慧人生	126
“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	130
“飞鸟之影未尝动也”	136
智者的智慧	137
 第八章 公孙龙子	139
思辨人生	139
“离坚白”	143
“物指非指”	145
“白马非马”	147
辩士的智慧	151
 第九章 荀子	153
博学人生	153
“天人相分，人定胜天”	156
“化性起伪”，“隆礼重法”	160
“天官意物，心有征知”	167
“明分使群”	170
哲人的智慧	172
 第十章 韩非子	175
孤愤人生	175
“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	177
“人性自为，可因不可化”	183
“古人亟于德，中古逐于智，当今争于力”	186
“守事理，因自然，不逆天理”	189

“循名实而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	192
法士的智慧	195
后 记	197
参考文献	199

引 言

百家争鸣——先秦诸子哲学的文化生态

中国哲学思想可以追溯到上古的万物有灵、灵魂不死、图腾崇拜观念以及神话传说。殷商西周的神权观念、天命靡常、敬德保民思想以及原始的阴阳五行观念，更是中国哲学直接的思想源头。理论形态的中国哲学思想是在公元前 770 年~公元前 221 年的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即先秦时期。这个时期对于中国哲学思想来说是决定性的。这 500 年间出现的思想观念规定了中国哲学思想的基本方向，奠定了中国哲学的核心和基质，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使中国哲学走向了成熟和辉煌。

早在殷周之际，在中国历史上就出现一批“脑力劳动者”——巫祝、方士、史官、武士侠客、文人辩士、政客法士等等，他们组成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知识分子”群体。巫祝、方士掌管鬼神祖先祭祀活动，以“通天人之际”为务；史官主管记事，以“推演古今兴亡”为职；文人辩士传授经典、指导礼乐、辨别名实；政客法士周游列国，定法规制礼义，为君主出谋划策。他们的思想活动形成了先秦诸子学说的渊源。

到了春秋时期，周天子王权衰落，中国社会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社会处于大动荡时期，无论政治、经济等方面都由过去的一元化向多元化转变。社会变革导致了众多有识之士不再满足

旧的传统所定格的伦理观念、价值标准，他们反省历史，针砭现实，企图解决新时代社会和人生的安顿问题。他们各抒己见，互不苟合，终于汇成了诸子百家争鸣的学术洪流，构成了先秦诸子哲学的文化生态群落。春秋战国时期学术思想空前繁荣，在古代世界大约只有古希腊才能与之媲美。对中华民族有根本性重大影响的儒、道、墨、法诸家，都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

先秦诸子百家，不是指哲学家或哲学派别有百家，泛指掌握各种知识和技巧的智者能人有“百八十九家”（《汉书·艺文志》），诸如天文、地理、兵术、医道、农业种植、冶炼技术等等都可包括其中。先秦百家里称得上是哲学派别的大致有六家——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名家、阴阳家。

儒家是崇奉孔子思想的学派，被列为诸子百家之首。《汉书·艺文志》云：“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儒家推崇“礼乐”、“仁义”、“忠恕”和不偏不倚之“中庸”之道，在政治上提倡德治和仁政，重视道德教化和“内圣外王”修养功夫，维护君臣、父子、夫妇、兄弟等伦常关系，以西周以来宗法等级礼仪制度继承者自居。先秦儒家出自文人辩士，代表人物有孔子、孟子、荀子等。

墨家的创始人是墨子，故称墨家。墨子曾受“儒学之业”，后因不满儒家的繁文缛节铺张浪费，“背周道而用夏政”，学习大禹刻苦俭朴精神，成为儒家的反对派。与儒家推崇宗法等级礼仪制度不同，墨家主张兼爱、非攻、尚贤、尚同、非命、非乐，强调功利，肯定人力的作用，重视器具技艺及其发明创造。墨子还讨论了认识的来源和检验标准问题，并得出具有经验论倾向的结论。后期墨家在逻辑学上有所建树，成为中国古代逻辑学的鼻祖。墨家是先秦唯一有严格纪律并带有一些宗教色彩的学术团体。墨家出自武士侠客，代表人物是墨子。

道家以“道”为世界的本质，故称之为道家，《汉书·艺文

志》曰：“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老子是道家的创始人。道家认为，“道”是宇宙万物的本源和内在必然性，“道”既决定了事物的产生，又规定了事物的性质。“道”虽然无形无象、无始无终，但又真实存在，并且自然无为而无不为。道家还从天道自然无为出发，要求统治者放弃强权政治，实行无为政治，主张绝仁弃义、绝巧弃智，要求个人达生、知命、无己、无待。道家反对尚贤政治和礼仪文明，向往淳朴蒙昧小国寡民的社会生活。道家人物都是一些很有学问的智者，但因深受当时社会动乱之苦，怀才不遇，无可奈何而隐入山野。代表人物有老子、庄子、关尹、彭蒙、田骈等等。

法家是先秦时期主张以严刑峻法治理国家统摄臣民的一个学派，《汉书·艺文志》曰：“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法家要求“不别亲疏，一切断于法”，强化了君主独裁专制。法家认为，强而有力的统治必须建立在成文法典的基础上，而不是道德说教上。法家出自政客法士，是统治者的顾问，前期法家有李悝、慎到、吴起、申不害、商鞅等，战国末期韩非子综合各家之长，提出法、术、势统一的完整政治理论，成为法家最大的代表人物。

名家是先秦时期以思维的形式、规律和名实关系为研究对象的哲学派别，亦称“辩者”。名家以擅长论辩著称，名家就名和实、一般和个别、概念的形成和转化等等问题进行争论，提出了许多深刻的哲学命题和逻辑问题。西汉司马谈批评名家“专决于名而失人情”，荀子批评惠子“蔽于辞而不知实”，但可以肯定名家对先秦形式逻辑思想的发展有相当大的贡献。名家出自文人辩士，代表人物有尹文、惠子和公孙龙子以及后期墨家。

阴阳家是以殷商西周盛行的阴阳、五行说为中心思想的一个哲学派别。据说这个流派的成员是由古代天文家和占星家演变而来的。阴阳观和五行说是周人用来解释宇宙万物生成和变化的两种流行思想。阴阳家在长期的天象观测中，看到“天则有日月，

地则有阴阳，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并以此来解释季节的变化和农作物的生长规律，成为一些掌握科学知识的人。由于当时社会生活的需要，他们还专长用天象来预测人事的吉凶祸福，把科学和巫术结合在一起。战国末期的阴阳家将阴阳五行思想推广到政治上，用“五德转移”论去说明人类社会的发展和王朝的交替——即五种物质相克相生周而复始的循环变化，决定了朝代的更替和历史的演进。阴阳家有邹奭、公孙发等人，其代表人物为邹衍。

以上学派虽然各有自己共同的祖师、共同的主张和共同的范畴，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学派自身内部发生了分化。派中有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交融承接。儒家分为八派，有子思、子张、颜渊、孟子、漆雕氏、仲良氏、荀子等等；后期墨家一分为三，有相里氏、相夫氏、邓陵氏；法家有重术派、重势派和重法派之分；道家有老学、庄学和黄老之学的不同。韩非一向被认为是法家的集大成者，但他不但继承和发挥了荀子的某些观念，还对老子的思想多有摄取。各家各派之间互相争辩，互相质疑，没有一种思想、一个学派能够取得绝对的统治地位。这就使得当时的思想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形成繁荣空前的学术潮流，创造了灿烂的中国古代精神文明。

礼崩乐坏——先秦诸子哲学的社会环境

百家争鸣的社会根源首先是因为社会处于大变动之中，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政权下移，一元化的政治格局被打破，新旧矛盾尖锐，问题百出，诸侯异政，百家异说。时代的风云突变为思想家们研究和思考哲学问题提供了社会实践的、思想文化的丰富素材。在当时，无论整个社会思潮，还是个别思想家，一方面与传统保持着一种扯不断的连接，甚至是对逝去的历史的一种眷恋；另一方面又在社会变革的推动下，开始了新的探索。守旧和创新、传统和变革错综交替，社会问题和哲学问题正是在这种复

杂的社会和思想的矛盾斗争中被提炼出来的。人们开始自觉思考宇宙的起源与人在宇宙中的地位问题；人与他人、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人生存的价值和意义问题，并在这些思考中建构起各种理论形态。同时人的理性得到巨大的张扬，心灵和思想的自由得到了巨大的拓展，反过来又推动了社会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其次，没有思想专制。周天子一统天下的政治专制统治的瓦解，使思想意识形态的专制统治也出现了一个暂时松弛阶段。大大小小的统治者忙着争夺权势，抢占土地财物这些实际利益，无暇顾及意识形态方面的变化。旧的意识形态逐渐丧失了它的权威，新的还没有建立起来，正是在这种相对开放的条件下，各家各派才得以自由争鸣和共存，形成了学术思想空前活跃的局面。也只有“百家争鸣”这种社会精神生活领域的“风暴”才能把人们从旧的意识形态当中彻底解救出来，实现观念的改变和思想的解放。秦统一中国以后，在政治上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在思想上也实行专制——车同轨、书同文、焚书坑儒，定法家为独尊，从而结束了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

再次，西周时期“学在官府”，文化教育、求知活动是统治者的专利，平民百姓无知无识。春秋战国时期，奴隶制崩溃，社会动荡不安，使得一部分贵族官吏衰败下来成为有文化的平民，也使得一部分平民接触到文化知识，于是社会上出现了一个新的阶层——无官职、无特权，以讲学教书、为人主出谋划策为生的士大夫阶层。这些人有文化知识，并依附于不同的贵族统治者，成为他们的思想代表。当时诸侯卿大夫私家养士成风，战国四君子各养士成百上千。社会需要士，于是培养士大夫的私学应运而生，最早创办私学并取得突出成绩的是孔子，据说有弟子三千，得意门生七十二人。战国中晚期，齐国为吸纳贤士，在都城临淄设置稷下学馆，先后到学馆求学的士人达三千多人，当时的著名学者宋钲、慎到、尹文、田骈、环渊、孟轲、邹衍人等都曾在那里讲过学，荀况还曾三任学馆的“祭酒”（学馆主持人）。新的教育形式的出现和发展，对普及文化知识有重要意义，也是春秋

战国时期学术繁荣的重要社会条件。

早慧的文明——先秦诸子哲学的形态特征

中国先秦时期的哲学思想属于一种早慧的文明，这一特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哲学在这一时期取得了理论形式而成为独立的思想意识形态。在殷周时期，哲学仍包含在巫术观念中，包含在史诗神话中，哲学思想只是天命神学外衣包裹下的个别观点，如阴阳对立统一的观念是包含在占卜书《易经》中的因素。五行思想是“洪范九畴”的第一种，且是上天赐予的。到了百家争鸣时期，哲学思想完全摆脱了巫术神话的外衣，以纯理论、纯思辨的形式展开了它们关于世界观的探索，关于宇宙之谜、人生之谜、文化之谜的解答，如老子的“道”的学说。老子把“道”理解为世界万物的本源和本体，他从“道”的性质、“道”与具体事物的关系、“道”能否被人把握、“道”的运动规律等等方面进行全面论述，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相对完整的哲学体系。

其二，哲学开始有了明确的研究领域，形成了一系列概念和命题。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哲学问题很多，主要有天人关系问题、名实关系问题、知行关系问题、义利关系问题、人性善恶问题、礼治与法治问题等等。思想家们提出了一系列范畴——天人、精气、太极、阴阳、道器、心性、名实、道理、有无、形神、动静、常变、言意等等，涉及到“宇宙之谜”、“人生之谜”、“文化之谜”等哲学问题的方方面面。德国现代思想家卡尔·雅斯贝尔斯说：“以公元前 500 年为中心，人类的精神基础同时地或独立地在中国、印度、波斯、巴基斯坦和希腊开始奠定。而且直到今天人类仍然附着在这个基础上……在这个时期，充满了不平常的事件，在中国诞生了孔子和老子，中国哲学的各个派别的兴起。这是墨子、庄子以及无数其他人的时代……这个时代产生了所有我们今天依然在思考的基本问题和基本范畴。”

——正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哲学提供了以后两千多年中国哲学史上众多思想家共同使用的哲学范畴，规定了以后两千多年中国哲学思想发展的基本轨迹、基本范式。中华文明就从这里演变发展，走向未来。

其三，先秦诸子哲学继承了古代遗风，与现实社会的政治伦理生活紧密联系。先秦诸子百家各有各的主张、各有各的道理、各有各热衷于探讨的问题，但他们都自觉寻求治国安民的良方，并以此作为学术活动的最终目的。先秦哲学充满批判精神，哲学家们关心政治、褒贬时事，对现实永不满意，并提出自己的革新意见，使哲学成为社会政治活动的理论先导。当古希腊哲学家把目光投向自然界寻找万物的始基、印度哲学家把目光投向彼岸世界为佛教的“来世”作论证时，先秦哲学家把目光投向人和人类社会自身。中国哲人们认为学术研究的必要性，不仅在于理论本身的价值，更在于满足社会、国家的需要。从内容上看，先秦诸子哲学十分重视人生哲学即人伦日用问题的研究，不关心纯粹的自然哲学问题。他们也探讨天或天道，但其目的是追寻协调人际、治理社会的人道。如孔子讲“仁”，仁有两个基本意思：其一爱人、泛爱众，涉及的是人伦关系；其二克己复礼，礼就是彬彬有礼的社会等级秩序，孔子要求人们克己复礼也就是要求人们安分守礼，保证社会秩序的稳定。再如老子的“道”是万物之宗，即宇宙本源，同时也是统治者治理国家之道。老子认为作为万物之宗的道“自然无为而无不为”，统治者要治理好国家也只能采取无为而治的态度。又如韩非子所倡导的法、术、势三者统一的政治理论，为统治者考虑得周到而全面。中国古代哲学的政治伦理特质是在先秦诸子哲学时代就奠定了的，而西方政治思想家在公元千年以后才有这样的见识。

其四，先秦诸子哲学获得的思想成果成为历代中国哲人的思想宝库，散发着永恒的魅力，她是以后两千多年中国传统哲学不可企及的范本。先秦诸子哲学是人类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发展不平衡的又一典型代表。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评〉导言》中

说：精神生产“一定的繁荣时期决不是同社会发展的一般发展成正比例的，因而也绝不是同仿佛是社会组织的骨骼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也就是说先秦诸子哲学不仅提供了以后两千多年中国哲学史上众多思想家共同使用的哲学范畴，规定了以后两千多年中国哲学思想发展的基本轨迹、基本范式，而且她所达到的理论高度，是以后两千多年中国封建社会出现的数以百计的哲学家无法突破的。如果说希腊人的哲学是“正常儿童”思想成果，那么中国先秦诸子哲学可以说是“天才少年”的智慧结晶。当古希腊哲学家提出“水是万物的本原”的个别论断时，中国先秦时期的老子已建立“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形而上的宇宙生成论；当古希腊的智者宣布“人不能踏进同一条河流”的经验性的著名命题时，中国先秦时期的圣人已有“有无相生，难易相成”、“反者道之动”的抽象程度很高的辩证法理论体系；当古希腊哲学家把目光停留在周边的经验世界时，庄子的精神已经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六极之下而不为深”的无限时空漫游。就像金字塔出现在科学技术十分落后的古代埃及令人费解一样，世人也对在公元前五世纪左右，物质文明相对荒凉的遥远东方，何以耸立起如此耀眼的思想灯塔而惊诧不已！

第一章 孔子



圣贤人生

孔子，名丘，字仲尼，生于公元前 551 年，卒于公元前 479 年。他的祖先是宋国的宗室，在一次政治动乱中衰败下来，被迫逃到鲁国定居。孔子三岁丧父，幼年贫困，年轻时做过小吏，三十岁左右创办私学，五十岁做过三个月的高官（鲁国的大司寇），后周游列国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晚年回到鲁国整理古代文献，教书育人。两千多年来，孔子被奉为圣人、文宣王、大成至圣先师。《史记·孔子世家》说：“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孔子执著地倡导和提升人类的道德理性，认为“礼”是人们治理社会的最高标准，“仁”是人生的最高价值。他教导人们奉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之道”，以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主张国家要实行先“富之”、后“教之”的仁政，注重民生问题。他认为文明的最高目标就在于造就理想人格以创建理想社会，通过“内圣外王”之道，达到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他提出的诸多道德信条，早已被内化于社会群体之中，造就了中国文化深层心理结构的框架和特色，他的文化影响遍及日本、韩国及东南亚等地，他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历史文化名人。学习中国传统文化首先必须了解孔子及其思想。